

來看是公平的，不因身爲台灣人而受歧視。那時的新竹小學都是木造的，我只能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校有教室及大禮堂，更有校園及兩百公尺的運動場、相撲場（日人叫土俵）、擺放明治天皇所頒的教育刺語（語錄）的房間，後來還添加了游泳池。據稱幾年前去世的昭和天皇（裕仁）在他還是太子時曾經來台訪問蒞校參觀，是新竹小學的一大光榮，在新竹小學的歷史上寫下很重要的一步。想不到這一位天皇後來成爲日本軍國主義的魁首。

我大概很早就以寫字很美而有名，小學二年級時，有一次班導師因病請假而該課變成自習，自習一定會有寫在黑板上的自習工作，我就受命寫這些工作在黑板上給全班同學看。以後有人需要找人

在黑板寫字，我一定是被找的人。又記得我每年夏天一定參加習字會，所謂習字會是學校請一位日本有名的書法家來教學生寫書法，每一年都是同樣那一位。在大禮堂裡幾百個人靜坐寫老師教我們寫的字，因爲人多難教，這位老師寫字都是喊口號的，他把每個字都分解成幾個筆畫來教，而且大聲喊：「一、二、三——四、五」，下面就照著他的指示一筆畫一筆畫地寫。現在回想起，這些夏天的習字會對我的書法有著很大的影響。

我也特別喜歡劍道，並不是嚮往武士道，而是喜歡劍道訓練的紀律鍛鍊，這種功夫在李登輝寫的《武士道解題》一書中有所敘述。爲了加入劍道社，早上還得四點鐘就到學校換制服，那制服與成



日本小學校三年級的全班合照，後排左邊數來第四個為筆者。



日本小學校二年級的全班合照，筆者站於左上角高峰上。

人的制服一模一樣，只是小很多，看起來很可愛。換了劍道制服以後，大夥都要以日本跪坐方式靜坐二十分鐘，然後穿上面具與腹部的保護用具，靜待自己的名字被呼喚上賽場，在衆目睽睽之下與對手比武術，並受指導員之指示與教導。我每日都在期盼著練習日的來臨，因為它是我愛好的運動之一。

當然人人幾乎都有膽怯的缺點，我不像三哥，他會樣樣都做得好，膽怯這個字在他字典裡似乎找不到。我小學時最怕的是水，所以游泳池是我的最恨，每次體育課都找藉口躲開，在新竹小學四年多，從來沒有與同學游過水，學游泳是到了新竹中學以後的事。我念小學時體罰也很盛行，但似乎限於罰站、摑巴掌而已。有一次，我經過教員辦公室的走廊，邊走邊吹口哨，吹的是日本的軍歌，結果有一個姓草野的老師叫住了我，說：「別吹口哨的命令聽見了嗎？」我說沒有，結果兩個巴掌像雨一般地落下來，使我覺得很慚愧。

日本的各級學校、尤其是小學，最有名而殘酷的是學生在校欺壓同學，欺壓的壓力來自集體，往往是由少數人選定對象欺壓，很多人就跟著這一黨人走。這種欺壓日語叫做「いじめ」，而英文叫“bullying”。這使被欺壓的學生對上學怯步，嚴重的還會導致自殺，是造成日本自殺率居高不下的一大因素。當時，欺壓在新竹小學並不是問題，我也沒有被欺壓的經驗，但就因為有一些學生見我是台灣人，讓我在四年之中有一、兩次無緣無故被打的經驗。其中有一位很難纏的學生叫內田巖，他之前還出席在日本舉行的同學會，我從未提起他曾經無緣無故打我幾拳的事，而他似乎早已忘了。我不拿手的運動就是相撲，如果我是相撲的能手，內田可能也不會找我麻煩。

我們的小學同學會一年一次在日本舉行，地點每年更換，但都是溫泉旅館，參加的同學幾乎都是日本人。有一次一群人到九州指宿一家叫「白水館」的旅館，指宿是一個地名，幾乎位於九州的南端。我們一夥兒第二天坐了專車參觀位於知覽地區附近的神風特攻隊基地，日本軍方之所以會選知覽為神風隊的基地，顯然是因為它近沖繩的緣故，是二次大戰最後困獸掙扎的象徵。神風特攻隊的隊員都是不甘願而死的，最近這真相由東京都市長石原慎太郎拍成電影，還聽說相當賣座，對此我很難理解。

我及二哥從來沒有因為功課而麻煩了父親及兄姊，每天努力地學習作息，早上一大早就起來念書充實自己。懂事以後，父母親擔心的事沒有別的，好像只有要我們早一點上床休息。這一段時候，日軍在中國大陸的為非作歹，台灣根本無從獲得消息，因位在台灣的日本人一般都是台灣人的

我回成大之後，有一次李國鼎先生被邀來成大醫學中心在該期畢業生典禮上致辭。節目中有一項是畢業校友贈送紀念品給母校，李先生因而知道我的毛筆字有特別的風格，因為該期畢業生所送母校的紀念品是我講的、我寫的話的複製品。等他回台北之後過了一個多禮拜，寄來了右圖的一首詩，是他的朋友在他退休時描述他一生而寫的。李先生要我以毛筆寫下這首詩，然後裱好讓他收藏。後來我發現他把它掛在他辦公室的入口，可見他對我寫的字的珍視。現收藏在他的遺物中。

名成身未老立言得上道靜者意有餘
富貴非所好君夷舊相識功業玉山顯
同年廿六人惟君申懷抱力侔少社稷
復漢仗師保海外小蓬萊十年歲豐饒
為竟中興功神賜恤恆春草三傑君獨健
天下為君福

國公策政推屬壬申年夏晚黃亮巖書

好鄰居，駐紮在台灣的日本軍隊紀律也很好。我記得有一戶姓櫻谷的一家對我們如自己親人，還有一家叫森本的，一九四五年回到日本之後在面向日本海的金澤附近開了一家溫泉旅店，我與內人曾於一九八〇年代拜訪過她。金澤有一大學，地處於日本的能登半島，是文化水準很高的地區，前陣子因為地震的關係受了一點損失。

轟炸帶來的一段奇緣

父親每天早上照常起床，配合收音機做早操已成了習慣，當時這成為他們的全民運動之一，以收音機體操著稱。一九四一年有一天，父親照樣早起做收音機體操，突然收音機的音樂停了而有以下的重要插播：「日軍於十二月八日，當地時間十一月七日，與美軍進入戰鬥狀態。」就這幾句話，台灣也捲入了因珍珠港事件而掀起的二次大戰。

戰爭的氣氛沒有馬上瀰漫到台灣，因為戰爭一開始，盟軍措手不及，日軍處處傳捷，是二次大戰時日本的蜜月期。日本在北方領土、南太平洋各地、菲律賓、香港以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皆勢如破竹，都有斬獲。當時鞋子是一種奢侈品，記得新加坡被日軍攻陷時每人就發了一雙橡皮鞋子，又日本的潛艇成功地擊沈美軍的列克辛頓號(Lexington)航空母艦時，我們都放了一天假，這都是

當學生的我們所歡迎的決定。但不久，日本海陸軍的補給線變得過長，美國重整軍力並在南太平洋諸島採取了跳島戰術的反攻，使得日軍無法阻擋。這種反攻，讓台灣開始也有了盟軍的「照顧」，最早受災的是故鄉的新竹。但偶爾盟軍的空襲也會留下以下的插曲，就因為新竹被炸，我與白修德(Theodore White)搭上了書信來往的奇遇。

那時我才九歲，那是一個陰霾濕冷的十一月風城新竹之晨，我因小時的關節宿疾發作請假在家，正想翻書閱讀，突聞遠處爆炸聲四起，我立即把書闔上全神傾聽，爆炸聲裡摻雜著飛機俯衝與爬高時的引擎聲，這如果不是日軍的實彈演習，分明是一個更嚴重的事態。我央求恰好回來娘家的二姊扶我出去，站在舊日新竹醫院旁的馬路，那裡已有一群表情肅穆、面顯焦慮的路人正引頸往西觀望。原來從市區往西幾公里、位於海邊的機場是日本軍用的，約莫在機場的地點正有幾團黑煙湧向天空，黑煙與白雲之間則有好幾架飛機穿梭盤旋，看似忙於搜尋地上獵物的鷹群，其中有幾架機體極具特徵的美軍洛克休P-38戰鬥攔截機。男生比起女生對軍機武器的好奇心本來就要來得強烈，我雖不算精通，卻能判斷這是美軍來襲，拉著二姊連跑帶滾地跑回家裡。轟炸的消息雖然被全面封鎖，但市井流言盛傳日本軍機皆來不及升空應戰，泰半被炸毀在地上。時一九四三年，只是我不記

得那是該月的何日。司馬遼太郎在他的《台灣紀行》中提到，據他考據，盟軍飛機第一次來襲台灣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轟炸新營的一次，這實為一錯誤。

童年易逝，不少記憶也逐漸朦朧，但那陰冷的早晨風城被炸的記憶，卻總是異常明晰。可能是一份畸異的傲慢在做祟，認為僅有幾萬人口的故鄉，居然會被美軍青睞成為台灣第一個轟炸目標，其中必有值得驕傲的緣由。但一九七九年白修德的一本巨著《歷史的追尋》(*In Search of History*)問世，卻為新竹的奇襲提供了幕後的真相。白修德是有名的新聞工作者、歷史家、作家，他是「一九一五年生於波士頓的猶太人，學東方歷史於哈佛，畢業時已能操華語。一九三八年間開始其世界之旅，次年四月十日抵達了當時的抗日首都重慶，愛上那裡每日上演的抗日大後方以及國共暗鬥的政治史劇，落腳一留就是六年；期間為維生計成為《時代周刊》的報導員，直到日軍投降。戰後寫了處女作《中國的暴風雨》(*Thunder Out of China*)一書預告共黨革命的來臨，更因此一舉成名，後來每次的總統大選記幾乎都是他的傑作。一九七九年這本巨著《歷史的追尋》可算是他的自傳，白修德在書裡以兩頁篇幅詳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群飛虎隊隊員在昆明獲得情報，指稱海岸近在咫尺的新竹日軍機場有準備轉進南太平洋的四十架轟炸機及六十架戰鬥機。對志高昂的飛虎隊

隊員來說，這是讓人垂涎的獵物，他們等不及上級命令，要求提早吃完感恩節大餐，於感恩節的二十五日清晨調度幾架P-38及B-25低空掠越台灣海峽奇襲新竹。白修德恭逢其事，成了報導那次作戰的記者。

我九歲時根本不懂何謂感恩節，負笈北美才知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週四，等我念完白修德的這本書，一下子空襲的記憶幾乎成了全新拷貝，有了正確日期配上，在我腦際重映，益顯得生動。他兩頁篇幅鉅細靡遺地記述從空中鳥瞰的轟炸經過，和在我地上所見的互相印證，更是帶給我拼圖遊戲終於完成的喜悅與震撼，甚至彷彿我感受到白修德坐在正俯衝而下的機艙裡的真實感。我不是一個麻木到對這種「奇遇」會毫無感觸的人，試想，一個當時的清靜新竹小市，被載有聞名四海的歷史家的飛機轟炸，而九歲的我竟然有幸在地上觀賞了大半過程，這事豈可不寫封信和白修德談個明白可以了事？但每日忙碌，又怕如收不到白修德的回音會帶來受不了的挫折，在躊躇之間只得任憑時光不斷流去。

不意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與哈佛的史華慈教授在上海錦江飯店邂逅，為我與白修德魚雁帶來了玄機。那是我結束在上海第一醫學院（現改名為上海醫科大學，併入復旦大學）講學一個月

啓程返美的前一天，那天早上我想吃早餐，前往飯廳卻發現已經客滿，只剩下有一對洋人老夫婦正在進餐的大桌可以同席，我只好接受了建議。就座後我自我介紹寒暄，老先生則說他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史華慈是哈佛漢學家泰斗教授，著有《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的興起》等成名作，於一九八七年曾應邀來台。史華慈當時正在講學旅行途中，來到上海住在錦江，和我謀面是極為偶然的事。他既是猶太人，又來自波士頓，我就問他認不認識白修德，他答曰：「當然，他是我的好友。」我趕忙把童年故事約略描述，並說我準備去函白修德。為提高能收到回信的可能，我問他可否在信中提及我在上海和他有過面識。史華慈對我的故事稱奇之餘，滿口答應並對我鼓勵有加。

於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去函紐約出版商轉白修德一封私函，寄出前還請擅長寫作的長女看了一遍，長女認為那是很動人心弦的一封書翰。裡面除了摘述事情始末之外，強調這一樁事對我來說是人生一大奇遇，我深信他和我倆人的人生旅途，明明是在新竹上空與地上之間擦身而過幾乎交集了。我說，這感受之深我如不抒盡，有違我個人珍重際遇的人生哲理。

屏息以待兩週過去，白修德的回信來了，他同意這是少見的奇緣。他說當天奇襲，本來預計會

有半數人機回不了基地，結果卻是突襲成功全員安返，連在地上觀賞的九歲的我也安然無恙並已成了華府喬大的教授，猶如傳奇。當他們返回基地後覺得整個過程既刺激又好玩，但他說：「這就是戰爭的問題所在，生存者慶生，而受害者呻吟。」信末並說他下次來華府將會找我痛飲，害得我立即急告我的地址與電話。但這夢終未成真，他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悄然逝世。

我素來喜歡寫信，卻從未夢想過有一天會以寫作為樂，所以當時與這位聞名的作家有書翰來往，已夠使我躊躇滿志，他的信自然也就成了我們的家寶。我把我的原函及他的覆函影印本裱框展示在我華府喬大、台灣成大院長室以及現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辦公室牆上，許多好奇的外賓仔細看過後都不停稱奇，不少外國女賓讀後還會感動得流淚。一九九一年我尚是成大醫學院院長時，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來了一位史教授 (Jack Spengler)，他讀後以嚴肅的表情問我要兩函的影本帶回波士頓。原來史教授的父親有一好友是白修德的弟弟，名叫羅伯·懷特 (Robert White)，他要把這影本寄給他。史教授回美約莫是一月，當年十二月，我從懷特博士那裡收到了一封措辭溫馨的私函，這才發現他是美國工程學院院長，等於是工程學域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信函內容大致說他正在蒐集哥哥白修德生前的書信，將彙集成書，我的兩封信是錦上添花，並且說：「史教授的父親是我的朋友，曾擔任美國氣象學學會執行長長達四十年。史教授遠到台灣的台南，在您的辦公室碰巧拜讀了您為五十年前的一件事寫給家兄的十年前的老信，事情終於牽到我身上，這不是人間奇緣奇事而是什麼？」當我唸完這封信，眼前不禁一片模糊，未知淚水弄濕了信紙。

我當然也認為這是難以置信的傳奇性佚事，我已經在四個不同的地方以「豐潤生活的小點滴」為題把這事向不少聽眾講演。但說實話，我心裡不覺得這是小點滴，小點滴才不會引起延綿數十年還蕩漾在生活的這些漣漪。如果不熱愛生活，不珍惜經歷，或不屑與別人分享感觸，這種漣漪怎能蕩得起？再說，沒有這種漣漪，生命對我來說會像是一灘死水，不會有閃爍的光彩，也不會是一幅活潑的動畫。

類似白修德的轟炸故事，後來在新竹重演不輟。有一次我的書法在新竹州比賽中脫穎而出，獲了獎，定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明治天皇的誕辰頒獎，地點在新竹州政府新竹市的圖書館。明治天皇的生日現在在日本叫文化節，是一個大節日。當時在典禮開始時突然空襲警報大作，新竹市陷入空防規定的程序裡，而我們這些小學生都爬入圖書館的桌子底下避險，心裡直覺好玩呢！

這樣的事愈來愈頻繁，表示新竹市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於是跟別人一樣疏散到比較安全的鄉下去。這種動作當時的政府命名為「疏開」，也就是疏散，這是必要的一個動作，為的是家人的安全。那時美軍的轟炸已經成了上班時刻的例行公事，早上八點鐘就有美軍的轟炸機光顧，支撐來決定。弄得我們上學不像上學，因為上學後被空襲打斷的機會蠻大的。

父親因為經常利用職權暗中幫助台灣同胞，因此到處都有準備拔刀相助的鄉親們，也就不難找到願意接受我們一家的鄉佬。我們找到的是當時在芎林當甲長的陳家（甲是居民的最小單位，所以甲長等於現在的鄰長）。現在的芎林是一片現代化的房子，當時那一帶卻是安靜而翠綠的田野之地。所借住的是一個房間斗室而已，一點都沒有奢侈可言，附近有一整列的高壓電塔一直通到新埔。位在一座山頂突出地方的鐵塔下有一塊平地，如果找地方坐下，可把新竹市被盟軍轟炸的情形盡收眼底，是我們小時候成群常去的地方。這看起來無辜的芎林，山雨發怒時也是不好惹的，而那成列的高壓電塔更成了芎林恐怖的象徵。

—老農夫的恩情—

那是一九四五年初夏下午的事，當時美軍連日轟炸日軍位於附近軍用機場，我們疏開的地方確定叫做犁頭山，我那時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因為疏散至鄉下，學籍也就隨之轉往由犁頭山徒步三十來分鐘方可到達的六家國小。當時的上課情況頗受空襲影響，有不少的課是在防空洞裡打發掉的。但是，六家國小的經驗卻不容忽視，學校要求學生要捲起袖子或換裝去下田、除草，樣樣都來，對小時候的我來講是難得的經驗。

犁頭山上的生活對我來說很新鮮，屋主姓陳，是客家人，並且如上文所說是當時所謂的甲長。我的客家話是當時與鄰居的小朋友相混而學會的，故當時與客家小孩一樣講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在醫學系畢業之後，即一九五九年，我還能以客家話看病，但現已淡忘了。這一點，我同意何曼德院士在他《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書裡的意見相同：「小時學外語比成人快，但學會的語言忘得也比成人快。」

陳先生的家孤獨地位於叢林密布的山腹中，附近還有一排高壓線，由山底爬上屋後的山頂直向北走，而我們租的只是四米四方的一個房間。陳先生務農，勤儉耐勞，家境小康，為人極為和藹。他有數個年紀和我相近的孫子，不上學時我和他們打著赤腳在陳家附近到處探險搜秘，捉蟋蟀、蜻蜓、蝴蝶、蝌蚪以及趕鴨、養雞，樣樣都來，怕的只是經常在附近出沒的蛇。有時候大夥兒下山到山腳處一條十公尺寬的山溪游泳，那時沒聽說過「環境污染」這四個字，山溪的水清澈見底，魚群悠游水中，周圍陪襯著翠綠的山景，與橫跨溪上寬約三十公分的簡陋木板橋，映在我童年的眼裡，倒也是一幅明媚的南國情畫。我卻沒料到這條我們常去戲水的小溪，當它怒吼時會多麼可怕與無情。

有一天下午六家與芎林一帶忽然黑雲密布，一片山雨欲來的模樣，學校一下課我就帶著書包往犁頭山跑。那時沒有柏油鋪面的公路，只有石頭鋪蓋的鄉間小徑，步行不易，我在路上使勁向前走，不到十分鐘，天色越來越暗，閃電與雨水以排山倒海之勢從山區衝下來。我心裡一意要回山腹的家，低頭彎腰抱著書包、淋著雨向前推進。那時的對電所知不多，最畏懼的是那一排高壓電塔冷酷無言地矗立在烏雲底下，似乎在暗示橫在我前面的逆境。突然間，我看到一道閃電打到前不遠的

電塔頂上，火花四濺，嚇得我裹足不前。當時我沒有手錶這種奢侈用品，不知是下午何時，好不容易到達由大路轉入通往犁頭山腳的小徑，天色已經很黑。我順利越過了一條約五公尺寬的小溪，全身溼透，沿著田埂，冒著越來越猛的雨勢，終於來到了位於山腳常來戲水的山溪。但橫臥在我前面的不再是那翠綠的山間川流，而是一道洶湧怒吼的濁水，平常在兩岸觸目可及、被溪水洗得淨白的石頭，都被波濤淹在水底，水面高到離站在岸邊的我腳下約一尺半的地方，我唯一賴以回家的木板橋早已不見蹤影。我心想回家無望，就趕忙掉頭想走回六家的老師家裡過夜，但走到先前那條小溪時，發現因山洪而暴漲的溪水把那塊小木板也沖走了。斯時的恐懼與不知所措真不知如何形容，但一味想返家的念頭又促使我回到山腳的大溪。溪旁有一座土塊砌成，大概是附近農民存放農具用的「土角厝」，我就蹲在簷下發呆，心跳卻一直悸動著。夜幕徐徐低垂，想家的念頭與不知如何是好的徬徨心情，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不禁嚎啕大哭了起來。

哭了好一陣子，突然旁邊出現了一位老農夫，穿著棕櫚葉編成的蓑衣，肩上荷著一把鋤子，顯然是在雨中做當天最後一次巡視田間的工作。他操著客家語問我是誰？住在哪裡？是怎一回事？我也操著客家話邊哭邊把來龍去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知道我是疏散到陳甲長家裡的城裡人，就

說：「不要哭，晚上就在我家過夜。」猶記得他牽著我的手在蜿蜒的田埂上走了十來分鐘才到他家。

比起陳先生的家，這是一座很簡陋的農舍，牆是土磚砌成的，地板就是一片裸露的硬土。屋裡顯得很陰暗，只有兩盞電燈，房內空空盪盪的，沒有幾件像樣的東西。除了農夫與妻子之外，我不記得他家裡有小孩。婦人馬上燒了一桶熱水幫我沐浴，給了我一套成人衣服換上，並與他們共進晚餐。我一直跟他們談了很多話，告訴他們在新竹城裡的生活，家有幾個兄弟姊妹，父親做什麼……等等，他倆也說了一些農人的生活與作息讓我聽。現在回憶，當時席間我和他們已經有了一座心橋。知道我想家的心情，老農夫答應一早就帶我回家。那時候電視當然還沒問世，鄉間夜晚泰半無事可做，吃完飯就上床就寢。屋外還是傾盆大雨，但我至少有一張乾燥的床。心裡雖然一直焦躁，但農夫的忠厚與關照使我覺得滿心溫馨，一下子就入睡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迫不及待地衝到外面觀看，陰暗的雲層依舊低垂，但雨已停歇。老農夫婦說不吃早餐不能走，我只好狼吞虎嚥地吃下了早餐，換上自己仍舊潮濕的衣服，我鄭重告別了農夫的妻子，農夫就帶我走向山腳的河溪。溪流水勢仍然湍急，但比起昨晚已平靜得多。走到被沖走的木板橋原地，突然見到母親與兄姊在對岸焦急地觀望著，顯得面對溪流束手無策的樣子。我不由

得蹦蹦大跳並且大聲叫了起來，他們見到我出現也雀躍地招手直喚我的小名。農夫告訴我溪流又深又急，所以我不能徒步過河，然後他就揹著我，小心翼翼地走入溪中，走到河心，水還淹到他的胸部，但他終於安然地把我到了對岸，把我帶回到家人的手裡。家人對農夫的感謝與對我生還的慶幸自不可言喻，父母親在物質匱乏的當時，還準備了厚禮去答謝了農夫夫婦。

我那夜的遭遇與家人整夜未眠找我的故事兩相對比，是家裡百提不厭的話題。後來，成家立業之後，我自己的三個女兒對於我這段童年故事也幾乎是百聽不厭。而我一直到現在，還清晰記得那一對雖然貧窮，但憐憫之心與人情味不亞於任何人的老農夫婦，也忘不了騎在他背上時所嗅到的、他為我流的汗水的味道；那昏黃電燈底下三人進餐的情景，在我的記憶裡更是依舊鮮活，彷彿是一幅不朽的名畫。不知他們如今在何處，但料想已不在人間。

住在陳家的那段時間，我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童，當時令我最雀躍的一天，就是「全副武裝」回去看新竹的老家。那是一日式的房子，日式的房子治安設備堪慮，但我記得日據時代的社會安全是很值得歌頌的。那時台灣沒有電冰箱這種高貴的電器，母親得天天到市場買一些日用品及當天要用的食物，但她就像其他與市場老闆熟識的顧客，並不必拎著所買的東西回家，店家會幫忙送來。

家門沒上鎖，就開門放在門內玄關，如果家門鎖著，東西就放在門旁。晚上睡覺如果太熱，就大開門窗躺在窗旁睡起大覺，也不怕宵小與樑上君子光顧。所以住在日式房子，人就算已經「疏開」了也無憂無慮，偶爾回去拿拿郵件就夠了，我最雀躍的就是這一天。陳家離新竹約一到兩個鐘頭的距離，老實說，那時的公共交通不多，僅有的幾條路線，包括台鐵，是又高級又準時的。陳家到新竹沒有公共交通可以搭，只好徒步來回。這種行程，一定要穿好準備能快速躲起來的衣服，以便為隨時都有可能來的空襲做準備，雙腳則要綁上「腳綁」，活像一小兵，像我喜歡的劍道一般，是我最嚮往的一天之一。

有一天，駐在新竹機場的日軍航空隊打下了一架美軍飛機，飛機殘骸在新竹圖書館附近展示，可憐的飛行員則在新竹市街被拖著示眾。他的最後命運不知如何，預料沒有好下場，因為日軍對付戰俘是不守「日內瓦協定」的，就像希特勒的納粹德軍一樣，如何苛刻，只有當事人才曉得。這一回顧，看看菲律賓巴當之役以後美軍俘虜所經驗的死的行軍，或英軍領導人在新加坡當地淪陷後被日軍給俘虜、帶到台灣東部的境遇就可見一斑。電影中所呈現日軍對待盟軍俘虜的情景，難免有些以票房為目的的戲劇化，但離事實不遠。

我父親不一定每天回到疏散的芎林家，但回家時總會帶一點山珍海味，等他回家，全家都會很快樂，不然每天就只好是吃高麗菜粥，吃得每一個人都厭倦了，可見當時（戰爭末期）物質缺乏的程度。

有一天父親一副焦躁的樣子回來，告訴家人戰爭結束了，美國發明並投下了兩個炸彈，一個投在廣島、一個在長崎，都在八月的上旬。這兩枚炸彈的威力大到廣島與長崎幾十年間生物無法生存等等，後來才知道這是誇大其詞。台灣的前途呢？台灣將交還中國，而在台灣的日本人將分批送回日本。當時芎林一帶沒有內容充實的報紙，消息的流傳多靠口述傳言，但父親所言恐怕不是扭曲或捏造。

戰後很久，手上有了一本麥帥的傳記，麥帥是太平洋盟軍地面軍隊的最高統帥，而當時美國海軍的最高統帥是尼米茲將軍。前者是蔣介石的好朋友，知道盟軍戰勝後台灣會「還」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故反對登陸台灣，怕這一登陸會大舉破壞台灣，怕交給好朋友蔣介石的台灣只是一片需大舉重建的焦土。但尼米茲將軍則力主登陸台灣而不要登陸沖繩，因為沖繩的守備完固，美國需付出的代價很高。兩人在羅斯福總統前激辯之後，最後麥帥勝利，羅斯福決定不登陸台灣而改攻打沖繩，派往中國戰場有名的史迪威將軍在中國戰場解職後也參加了沖繩戰役。我手頭上也蒐集了一些沖繩戰役時美國大兵救沖繩小孩的照片，最近日本教科書扭曲了史實是遺憾的事，我相信沖繩的平民跳崖自殺，無疑是有日軍幕後的慘恿或強迫。

——台灣變天的開始——

這是台灣變天的開始。

我們家人和其他人一樣，樂見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家譜裡寫的我們的祖籍在泉州府同安縣

十四都盛明鄉安仁里連厝保上店社，所以我們祖先來自中國沿岸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而我們是第八代的移民。但我們也得承認，經過幾代人獨自經營之後，不同的社會會產生不同的文化，交通的不發達會使得這種文化的差異愈大，這是難免的社會文化演變。就以語言而說，現在全世界據估計有六千種方言，而其中三百三十六種已經瀕臨消失之命運，也是這種演變的後果。現在全世界都在講全球化，此趨勢最後必定滲透到語言層面，這是交通發達的一種自然結果，而英文已經漸漸變成世界公語了。我們家人很歡迎盟軍的勝利與中國的勝利，心裡迫不及待、也很好奇地等日本人的全面撤退。光想這是一個新的局勢，不管結果會如何，就夠使人有所期待。

社會安全情況既已改善，我們就告別了芎林的陳家而搬到竹北面向縱貫道路的一棟房子。為什麼我們家裡要繞這個彎兒我現在已經說不清楚，家裡也沒人知道詳情而向我解釋，只記得那時的竹北是很吵雜的地方，使我每天生活過得很不慣，思念新竹老家的情緒愈是強烈。不久，我們終於搬回了新竹省立醫院隔鄰的老家。

戰後，社會有了驟然的改變，新竹市區的日本人都在準備回日本，他們把所有搬不回去的東西堆在路邊擺攤子賣，那時日本人擺的攤子到處都是。在日據時代有不少台灣人受日本人欺壓的個案，有人就趁這個機會報復，報復的對象除日本人外，也包括身為日據時代的公務員。但父親為人正直而受民衆愛戴，很多人圍上來保護父親，根本沒聽說過受人威脅的事。

大家一心一意等待接受日軍投降的中國軍隊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到達基隆，接著散開到台灣各地，我們小孩（那時我才十一、二歲）及大人皆沿街排隊歡迎這軍隊。那時派台的國民政府軍據稱是陳儀手下的七十軍，程度之差，比起日本的軍隊差一大截；主要的缺點是軍紀散漫，很多七十九歲的軍人好像也沒見過現代化的設備，交通規則對他們而言則根本聽都沒聽過，自來水、電燈壓根兒見都沒見過的比比皆是。這分明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的失策之一。派來接收日本軍隊的國軍居然有紙傘、大鍋等一般家庭的裝備，不像現代的軍隊，如果派來的軍隊是由青年軍等知識水準較高的部隊，後來的演變可能不同。

社會驟變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日本人遣返的第二天開始，本來可以生飲的學校自來水突然公布不能生飲，表示自來水的處理發生了問題，至今，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恢復。通貨膨脹是另外一個問題，一隻冰棒賣到快一百塊錢，日本投降一年以後從新竹到高雄旅行居然要二十五萬台幣。社會治安也明顯地惡化，民衆開始為自己的住所裝鎖、鐵窗、鐵門，這些在台灣都是第一次出

現。而台鐵不但品質變差，貨車代替了幾輛客車，班次的準時也根本談不上了。

雖說這些是戰後紊亂、兵荒馬亂的當然結果，而且有人說這種亂象是戰後的當然現象。但究竟它還是戰勝國「君臨」台灣接收的先遣榜樣，政府應有未雨綢繆的沙盤推演才對。

—戰後的台灣小學—

失望歸失望，該做的事還是非做不可。父親的漢學本來就很好，這時還預期不到後來的演變，而雀躍於他所擅長的技能有用的一天終於到了。我們留在家的兄弟姊妹晚餐後都圍在以父親為中心的小圈子唸起《三字經》，每天晚上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始。現在想起這《三字經》有多少用處，是個大問題。根據十九世紀的生物演化論，即達爾文的理論，幾百萬年前的人類來自野獸——猩猩，這些猩猩都有類似的獸性。後來就像馬克·吐溫所說，人類是因為新皮質把蠻居在含有獸性的舊皮質蓋住了，把人本來就有的獸性也一併蓋住。蓋住的程度因人而異，因此才有所謂不同的倫理、虛心、利他……等人類特有的性格出現。這從外蓋住的力量不是遺傳，就此

是教育，即馬克·吐溫所說的外力，這外力可以教育的力量加強。但禍到臨頭，被逼到牆角、千鈞一髮之際，每個人舊皮質的獸性會一一顯現。所以我現在是一個堅信「人性本惡」的信徒，並不贊成孟子的人性本善說，現今媒體報不完的社會新聞，哪一件不是在人性的盡頭，而獸性露臉的結果。不過在一九四五年當時，父親怎樣教，我們就怎麼學。

我讀的小學也換了，一九四五年我被分配到南門新興國小念完剩餘的小學年限。那時，台灣的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厲害，大部分學生都無鞋子可穿而打赤腳上學，我為了要與別人相同，故多半的時候也打赤腳上學。但我在新興小學也受了不少氣，那時有一批台灣人對大陸來的人已經開始產生了厭惡之感，故把他們稱做「四腳」，意思即指在地上爬的豬，這種思考在小學生之間也蔓延了開來；而日據時代與日本人親近過的人，像我，戰後才分配到一般小學念書的叫「三腳」，是從四腳演變過來的新名詞，我在校內便是以三腳出名。但後來知道，在學校要出人頭地、保持一個人存在的尊嚴，不是別的，靠的還是學業的表現。

上新興國小留在我記憶的是上學時會經過的南門街一家米店，米店的小開是現已名聞全國的洪星程，他完全是靠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成功而出名的。每天早上我還會到這家在附近也小有

名氣的米店邀洪同學一起走到學校去，洪同學後來也到新竹中學受教育，之後考入了台大經濟系。

在學校所學的除了算術有點像樣以外，國文的ㄉㄉㄇㄞ簡直是簡單到像在開玩笑，所念的大部分是「貓追老鼠，老鼠跑」一類的文章，根本談不上什麼國學。在十九世紀東瀛的明治維新時代，創立慶應大學前身的福澤諭吉在其自傳裡說：「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全國的所謂學問就是漢學，有學問的人是學優秀漢學學儒。」我現在寫起文章有魚目混珠的感覺就是這

個原因，因為我沒紮實的中國文字基礎，而台語及台灣的文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頗深也是事實。日人不掩飾這點而公開地承認，影響他們國家最深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朱熹、王陽明兩人，看以前源義經等人寫的毛筆字之漂亮即知其來有自。



與陳添德（右一）、楊建澤（右二）、周應龍（右三）、洪星程（右四）等人合影。